

先达和棉兰的文教报业的锻炼

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(一) 1

1932年9月24日,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先达市郊的咨哈八村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村子度过的。玩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游戏,如:斗橡胶子(bili para)、斗陀螺(main gasing)、敲打胡子幽(main patok lele)、玩玻璃球(main guli)、玩弹弓(panah)、踢足球,等等。这些项目可能其他地方也有,但我们的玩法异采纷呈,有花样,有难度,有刺激。

兄弟中,我最贪玩,结识的原住民同龄玩伴也最多。这对我日后成了印尼文翻译起了积极作用。

有时候,在家做作业或温习功课,那些玩伴就围在家门口,以各种方式,或吹口哨或打手势,诱我出去玩。此时,我虽然已心不在焉,但仍然不敢贸然出去。总要察言观色一番。看准了父母的表情,才敢出去玩。

有时为了讨好父母,我会主动多做一些家务活,如砍柴、劈柴、到河里挑水,以换取多出去玩的机会。这一招还挺灵验的。

皆哈八村,座落在荷兰人经营的橡胶园和当地苏丹领地印尼村落的结合部。

印尼村落绝大部分为马来族,信奉伊斯兰教,文化水平较高。橡胶工人全部是从爪哇岛招来的契约劳工,过着集体生活,比较纯朴厚道。我的玩伴绝大部分是橡胶工人子弟。

1995年12月,我和妻子瑞玲回印尼探亲,还专程回到咨哈八村,探望我的邻居们。由我大哥黄树武和吴鹏程带队,同行的还有肖邦杰、李洁霜、陈玉霞、林锦寿、香玲、苏汝琴、江炳文等,分乘两辆车,开进咨哈八村。这阵势引起村民的好奇。

村子面貌依稀可辨。那条通往新拿刹的土路破败不堪。我们的“旧居”已不复存在,原址由邻居盖起一幢小屋。就在这个小屋前,我见到比我大两三年的邻居安哇尔(Anwar)。他的模样变化不大,



黄书海(1932-),印度尼西亚归侨,广东人,1963年回国,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。

《生命的感动》著者黄书海,“谨以此书重温生命的感动,给友人和儿孙们留下一些念想和时空。”

我还能认出他来。他对我端详良久,还没能认出来。站在一旁的树武提起我的乳名Si Pesek。他大吃一惊,马上把我抱住。松开双手时,脱口骂我一句:“Ini pukilek, tukang copet jambu saya!”(你这臭小子,老偷吃我的莲雾!),随即哈哈大笑。此情此景,谁又能不为之陶醉呢!

可是,我儿时那么多玩伴,而今安在?!

安哇尔的父母,在我们搬离皆哈八村没几年,就相继病逝。后来,他大姐Uung、大哥Salim、二哥Yayah也先后去世,留下他和小妹妹Ida。

他们兄弟姐妹的名字,我一个也没忘。
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。可是,皆哈八村和安哇尔这一家似乎被时光定格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,境况毫无变化,甚至比原先还差,令我感触颇深。侧隐之心,油然而起。

我7岁上学。在先达中华学校念完初小高小。但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小学时曾留过一次级。这是我贪玩造的“孽”。留级,在兄弟同学中,很丢面子。但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住。知耻而后勇。放假期间,我发狠温习功课。

黄妙贤班主任对我很严

厉。新学期一开始,她要我背诵语文。不是从第一篇开始,而是从倒数第一篇开始。几经周折,终于拿了下來。没有表扬,也没挨藤鞭。

有一天,吃过午饭,我从二楼教室下来。中途,我用铅笔在洁白墙上涂鸦。

刚涂上两笔,就被黄老师逮个正着。她站在一楼办公室门口,向我大喝一声,令我马上过来。到她跟前,我主动伸出右手。她在我手掌上抽了几下藤鞭,并训斥我几句。我没哭,知道自己做错了事。

我并不记恨她,而是敬畏她。

记得,2002年,黄老师病逝前一年,我曾与她通过电话,谈得很开心。1952年她与陈失因先生回国后,我们未曾相见。有好几次,我因公出差上海,很想去拜访他们,但最终还是因时间安排不开,未能如愿。

她说,虽然未能相见,但对我的情况略知一二。

闲聊中,我提及上述两件事,并感谢她对我的严格要求,使我获益匪浅。她哈哈一笑,并自责说,过去那种家长式教育和体罚真是舍不得。

其实,先达中华学校在三四十年代,总体来说

是实行文明教育的。新与旧、中与西,各种教育元素,在这所学校里兼容并蓄,海纳百川。这是当地一所很了不起的学校。它对弘扬中华文化和培养各类人才,做出了历史性贡献。

我在中华学校平稳地接受了完整的小学教育。后来,随着时局的变化,学校发生几次学潮。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被开除出校。从此学校每况愈下,逐步走向衰落。

我的初中,基本上是在华侨中学度过的。所谓“基本上”,是因为初中一年级还在中华学校上。我在“火花级”负责编壁报,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秀白对我们实行党化教育。李老师恼羞成怒,没收了壁报,引起师生争执。这是整个学潮的组成部分。

掌权的国民党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学生自治会全体成员后,便对在班级里经常“闹事”的学生下手。学校当局以这些学生没有按时交学费为借口,停止了他们的学籍。我是其中之一。

当时“通知”发给家长,我本人不知道,也没有抗争。事后很长时间,我才从树武那里知道此事。树武一直信以为真。

这个“黑锅”,我背了几十年。直到90年代,我的同班同学陈保杰来京旅游谈及此事,真相才大白。他也是被勒令停学的学生之一。终于为我卸下了一黑锅”。

华侨中学创建前一段时间,我们没有课上。于是我和

林友联、黄光辉等相好的同学,自发地形成学习小组(后来被戏称为三剑客),大量阅读课外读物,并交流看法和学习心得。

我们读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读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《孔乙己》《祥林娘》,读茅盾的《子夜》,读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》《铁流》,读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《海燕》,读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……

这些书对我们后来的政治取向和世界观的形成,起了关键性作用。我们向往民主自由,反对蒋独裁。

我们的读书活动经常安排在光辉家。由于年龄关系,当时我们不可能参加抗日地下组织,但我们的读书活动却深受参加抗日地下组织的老师们的影响和关切。

我二哥树泉是抗日地下外围组织共学社的成员。记得有一次,他带回一本日记,里面记载着作者在印尼游击区活动的情况。从笔迹判断,以为是王任叔(巴人,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)的日记。结果判断错误,这是张华天托树泉代为保管的一本日记。

后来这本日记是“完璧归赵”,还是留在家里连同我的几本日记一起被父亲“付之一炬”?连树泉都想不起来了。

曾经教过我的几位老师郑子经、李国海、肖邦杰、宋凉赞、林少青、伍燥沾、陈斯刚、丁前清…都是当地



印尼归侨黄书海正在阅读《归国华侨史料丛书》